



孔子孟學說叢書

戴君仁等著

春秋三傳研究論集



孔孟學說叢書

春秋三傳論文集

陳之凡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春秋三傳論文集

著者：戴君

仁等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十一樓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定價：新臺幣（精）一一九元
（平）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初版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030(69-95)

弁 言

先師孔子，繼往聖，開來學，鎔鈞六經，以授弟子，一時三千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玉振金聲，可謂盛矣，故鹿門皮氏云，孔子前，不得有經，孔子出而始有經之名，經籍之傳，從來尚矣。

七十子後，百餘年而有亞聖孟軻，稱堯舜，學孔子，張皇聖教，以奠定我民族文化不拔之基，荀卿以降，下逮歷代諸儒，又復薪火相傳，彪炳辭義，蔚爲大觀，於是經學之疆宇日廣，其間雖有派別之分，漢宋之別，然而祖述孔孟，闡發微言，後先相承，其揆一也，故所謂經學者，其異在觀點與方法之不同，抑何有於考據義理之區哉，吾人博採旁徵，取精用宏，固所宜耳。

蓋常聞之，天之精神爲日星，地之精神爲河嶽，人之精神爲經籍，經也者，人理之常，如徑路之無所不通，故曰，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先總統 蔣公憫聖教之式微，傷經學之不

昌，以爲是乃 國父思想之本源，復興文化之要務，洞燭神蘊，爰於民國四十九年，手令成立孔孟學會，自兼名譽會長，以示提倡，而研究中心，則以儒家孔孟之傳，闡發經義爲宗旨，其所以經緯人倫，彌綸彝憲者，徵光偉烈，無遠弗被矣。

至是厥後，孔孟學會應屈理事長仰承 蔣公旨意，於是年有學報，月有月刊之發行，類皆海內外少長學人，研究心得之薈粹，歲月既久，篇章雜沓，立夫有感於翻閱參考之爲難，不得不作分門歸類之整理，於是編爲經學叢書，公諸於世，其中論文，區爲八集，計經學總論之部，易經之部，書經之部、詩經之部，三禮之部，三傳之部，論孟之部，學庸之部，由黎明公司承印發行，罔計盈虧，尤堪嘉尚，惟歷年論文，篇帙裒聚，或作者已付專集，或文詞過長，容有未能盡收，僅附篇目，用供查考，非有所軒輊也，尤冀此編之出，或爲我復興基地經學論文之總匯，有裨士林參考，臻益文化復興，無負先總統 蔣公倡導聖學之初志，塵山落海，倘非奢望也歟。

陳立夫

春秋三傳論文集 目錄

春秋在羣經中的地位	戴君仁	一
孔子與春秋	吳康	九
孔子的春秋教	高明	一三
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及其書法	仇同	二七
孔子修春秋及其對史學的貢獻	莊金德	三五
春秋的根本精神	穆超	四一
春秋尊王攘夷	賴炎元	四七
春秋精神及其對東亞各國的影響	朱雲影	五五
孔子之春秋與司馬遷之史記	洪安全	六三
春秋與三傳概述	劉德漢	八三

春秋三傳名氏稱謂例辨正	戴君仁	九五
左傳對於孔子春秋經的關係	高葆光	一一七
春秋左氏傳時月日例辨正	戴君仁	一二三
左傳史論	莊雅州	一三九
讀左傳會箋札記	田宗堯	一五三
賈誼春秋左氏承傳考	王更生	一六五
春秋比事與左氏占驗	簡翠貞	一八五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平議	簡博賢	二〇三
從左傳中所見到的四夷的文化教育	陳 槃	二二五
春秋穀梁傳阮氏校勘記補正	田宗堯	二四三
穀梁傳傳授源流考	王熙元	二五九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例辨正	戴君仁	二八三
春秋公羊傳時月日例辨正	戴君仁	三〇七
春秋列國遷徙考	陳 槃	三三七

春秋在羣經中的地位

戴君仁

六經是儒家寶典，都經過孔子之手。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衛返魯，開始編著六經。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蹤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這是敍書禮兩經爲孔子所編次。世家又云：

「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敝如；縱之純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這是敍孔子正樂刪詩。刪詩之說，雖頗爲後儒所疑，但三百五篇，曾經孔子編次，當爲可信的。世家又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

彖、象、文言等，這是所謂十翼，亦謂之易傳，世家說是孔子的作品，但後儒亦多不信。認為易傳必非孔子所作，亦未必一人所爲。他們的看法是很對的。可是孔子曾經研究過易，且曾申說其義理，應無問題。雖「五十學易」，易字或作亦，且在論語中，只舉到一次周易的爻辭。但從文言、繫辭所引子曰，可知內中必有孔子所說的。

綜合上文看起來，雖然詩書等經，都曾經聖人之手，而沒有一經是他作的，只不過是編的，只是「釐正次第之」而已。

孔子手著的經書，惟有春秋一經。世家說：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這裏說孔子因史記作春秋，雖有所因，可是作的。是他根據魯史，寫成了春秋經。所謂史記，即指魯史，春秋本魯史舊名。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離婁下）從司馬遷敘孔子修經，對春秋特別詳細這一點來看，可知太史公特別重視春秋，正因為春秋是孔子所手著的緣

故。在此以前，孟子也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也認為春秋是孔子作的，作的當然比編的重要。所以六經都是儒家的寶典，我們不容軒輊，但就孔子說，廣一點就儒家說，春秋更比餘經來得重要。

史記自序裏引董仲舒的話說：

「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董生是西漢春秋學大師，這一長段論春秋學的話，最能道出春秋的要義，我們就這段話分疏：

1. 孔子因身不用，道不行，而作春秋，可見春秋是孔子理想所托。
2. 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3. 春秋以道義。
4. 春秋爲禮義之大宗。

至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世所謂褒貶之義，雖出於董生之口，有些過尊孔子，我們且不談。我們要指出這四點，作爲春秋要義，是由于春秋一經，乃孔子意圖挽救當時時代病症的藥方，所謂撥亂世反之正。他因身不用道不行，不能當位治世，救亂扶衰，只好開藥方，我們可認爲是他的理想所托。孔子的時代，正是亂世，亂的情形，可以說萬端不盡，而其總因，只是一個不合理，即是失義。政治上社會上所做的盡是些不合理不應當做的事情，而其所以相沿相襲做不應當做的事情，由于不辨是非，不知義，不曉得那些是對的，該做的，那些是錯的，不該做的。所以董生一則曰，春秋辨是非，春秋以道義；（道，言也。）再則曰，春秋禮義之大宗。禮義固然都包括知行兩方面，而禮者履也。偏重踐履方面，可以說是合理的行爲。義者宜也，須要先辨其宜不宜，應該不應該，清清楚楚是與非，也可以說是合理的見解。（朱子注孟子知言養氣章云，義者，人心之裁制。今用其意。）這樣，

禮義是相成的。春秋道名分，譏僭越，惡爭奪，那是禮邊的事；別嫌疑，明是非，善善惡惡，都是義上的事。宋儒呂大圭春秋五論論春秋爲明是非之書，意思很好，現在節錄一段於下：

「……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又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以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論一

呂氏之論，甚爲精卓，和董仲舒的辯是非，可謂千載同心。

以上已申說了春秋辯是非，再進一步論春秋「治人」。世儒既認春秋爲褒貶賞罰之書，甚至於認春秋有貶無褒，於是春秋只是聖人一部刑書，這便偏於消極制裁一方面，而引發了許多深刻之論。實則春秋長於治人，治人就是經世。宋儒程伊川在他的春秋傳序裏說：「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道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伊川提出了經世之大法，經世治人和辯是非是相關的。所以伊川又說：「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在古人，莊子書中也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齊物論）這表明春秋是孔子在政治上積極的理想所托。

孔子的政治上最高理想，是天下爲公，宋儒胡安國的春秋傳，曾一再舉出此義，我們也選錄幾條：

胡傳卷一：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云：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又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云：「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又卷七莊公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傳云：「春秋大義在于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侯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春秋書王正月，大一統，這就是天下主義；夷狄可進則進之，也是天下主義；並不拘于一國爲尊。胡傳拈出天下爲公爲春秋大義，不算附會。況春秋以明是非爲主，是非之極至，必然歸于至公。那麼，說明是非推衍到天下爲公，也是理所應有。以春秋和禮運相配合，胡氏實在康有爲之前。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已是春秋的價值，價值既明，則在經書中地位可知。況春秋是孔子最晚成的一經。據孔子世家，孔子返魯在哀公十一年，返魯後開始修經；而作春秋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至十六年孔子便去世。那麼，作春秋是編定詩書等經之後的事。所以朱子說，「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這樣看起來，春秋在羣經中，當然是重要的。

孔子與春秋

吳 康

世界上任何一個有悠久文化的國家民族，必有廣博的文獻，以爲其思想的淵源，然後能取精用宏，葆世滋大。中國爲世界古文明國之一，其偉大的傳世文獻，是有名的經史子集四部書。其中尤以羣經爲後來一切著述思想之所本，而孔子的春秋，即爲其中之一。本文討論的題目，是「孔子與春秋」。詳細說來，是孔子和他在春秋中的政治哲學。

春秋是儒家相傳的六藝之一。六藝亦稱六經，爲詩、書、禮、樂、易、春秋。樂以音律爲節，其書不傳，故自西漢以還，亦稱禮五經，以缺少樂經故。（現存禮樂記作於漢時，然其義極精，以當樂經可也。）

六經或五經中的尚書與春秋，皆屬史類。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玉藻與此相反，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故劉子玄論史，首立尚書春秋二家（史通六家）。此二經可云是紀事本末與編年兩體之濫觴。

但尚書春秋之在古代，其被採用爲教材以施教，則等級不一。據禮王制說，古代國學，祇教禮樂詩書，未言及易與春秋。易言天道，春秋以斷人事，是較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可以研讀，可以了解

的。試觀孔子本人晚歲始精研易理和筆削春秋，則知其平日對於及門高弟，纔取此二書與之講論研究，至於一般門人，祇受詩書禮樂之教，而不及上聞易與春秋的微言奧義。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們且說春秋。

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記，孔子取來刪削改作，杜預春秋序，言之甚詳。魯史記原文，公羊傳叫它「不脩春秋」（莊七年），孔子改編後，即成現存的春秋全經。

春秋是史呢，還是經呢？換句話說，它是紀載過去事實的歷史呢，還是蘊含有系統思想的哲學呢？我們的答案：春秋是經不是史。因為就史的觀點言，春秋有兩大缺點：一、紀事簡約而不銜接，二、掩飾真相而非實錄，此皆作史的大忌，難怪宋朝王安石要罵春秋爲斷爛朝報了。

但就經的觀點，即哲學的觀點言，則春秋一書，極富於微言大義。司馬遷說，孔子作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漢書藝文志亦言之）。可見春秋是一部發揮王道的理論，即講論治道的哲學之作，換句話說，是一部古典的政治哲學。

不過春秋本文，簡約已極，其中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者，皆口說授七十子之徒（同前），以此遞傳下去，遂產生所謂春秋傳。現在所存的有三種，所謂春秋三傳。

三傳中的左傳，詳於紀事，是屬於經學中的古文學派（左傳與春秋之關係，及其自身真偽等問題，學者甚多討論，此無暇及之）。公羊穀梁長於義法，是屬於經學中的今文學派，今古文兩派爭論